

第 一 部 分

斯大林在党内的晋升和扶摇直上

第一章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

一、1917年前的斯大林

西方的斯大林传记作者很关注斯大林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因为他们正确地认为，一个人个性的基本特点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形成的。正如亚·乌拉姆在他写的关于斯大林的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斯大林贫困和艰难的童年对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很早就把他变成了一个多疑而粗鲁的人，他俄语掌握得不好，不动感情，受缺陷情结的折磨，狂妄自大，蔑视对一个格鲁吉亚人十分重要的血缘和个人友谊的传统。

众所周知，斯大林（朱加施维里）于1879年12月9（21）日出生在格鲁吉亚小城哥里的一个穷苦家庭里。他的父亲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出身农民，在哥里干鞋匠。他没有文化，性格粗鲁，不能对儿子产生好的影响。而且

乌拉姆，亚当：《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纽约1973年版第19—20页。另见：塔克，罗伯特：《革命家斯大林（1879—1929）》，纽约—伦敦1973年版；马里，琼—雅克：《斯大林》巴黎1967年版。只有一位我们熟悉的西方作者——伊·恩·格雷——在他写的斯大林传记中断言“血缘、环境和童年不能对他（斯大林）的性格和生活作出解释”。见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加登城（纽约）1979年版第13页。但是格雷的看法受到了许多评论令人信服的批评。例如，见L. 凯利的文章，载于1979年《书籍和书商》12月号。

他很快就离开家庭，移居梯弗利斯，一度在那里的皮鞋厂干活。后来他返回哥里时已重病缠身，他去世时儿子还是个半大孩子。斯大林后来从未谈起过他的父亲，官方的斯大林生活动年表中也没有提到他父亲的死亡日期。

斯大林的母亲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泽也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她靠缝纫和洗衣服为生。她没有时间教育孩子，于是年幼的索索（这是童年时斯大林的称呼）大部分时间是在大街上度过的。他并非朱加施维里家唯一的孩子，但其他的孩子很早都夭折了。斯大林在童年时患过天花，因此脸上留下了麻点。他后来在文件上用过的各种化名中有一个叫“里亚博伊”。^② 斯大林 12 岁时在一场车祸中伤了左手，久而久之左手变得比右手短，没有力量。他精心地掩饰左手不好使的缺陷，尽量不当众脱衣服，甚至很少伸给医生看。

斯大林早在童年时就表现得固执，总想比同龄人高出一头。他没有多大才能，但很顽强，读了很多书。索索个子不高，体力不强，不能指望在孩子们打架时能打赢，总怕被人打了。他很早就性格内向，报复心重，一辈子都不喜欢个子高、体格健壮的人。斯大林很早就热中于追逐荣誉。但他是个穷孩子，又被认为是异族人，他明白一个来自外省小城的格鲁吉亚穷青年在沙皇俄国不能有多大作为。格鲁吉亚作家亚·卡兹别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379—387 页。有证据表明，斯大林的父亲常常严厉惩罚幼小的索索，他还经常与他自食其力、笃信上帝的妻子吵架，他妻子微薄的工资是这个人口不多的家庭的基本生活费。格鲁吉亚侨民书刊中有材料说斯大林的父亲（一部分同乡认为他是奥塞梯人）是在 1890 年一场小酒馆的野蛮斗殴中被杀的。

② 俄文为“Рябой”，“麻子”的意思。——译者注

吉的著作和命运对年轻的斯大林产生很大的影响，卡兹别吉是格鲁吉亚一个十分富有的地主，他免除了自己农民的赋税，放弃了财产，几乎有十年时间像一个普通牧民那样住在深山里。从 1880 年至 1886 年他才从事写作。忧郁症和严重的精神病不久就夺去了他的生命。斯大林特别喜欢卡兹别吉描写山区农民争取独立和自由斗争的长篇小说《弑父者》。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无所畏惧的柯巴——也成了年轻的索索心目中的英雄。他甚至开始把自己称做柯巴，这个名字便成了朱加施维里第一个党内的化名。老布尔什维克在 20 世纪 30 年代（而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更晚的年代里）往往把斯大林称做柯巴。后来斯大林有了不少党内化名，他被称做伊万诺维奇、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但是柯巴这个名字和斯大林这个假姓终其一生都在使用。

当索索八岁时，母亲送他去哥里正教小学。斯大林用六年时间读完了学校四年的课程。他学习很困难，因为学校的教学基本上是用俄语进行的。斯大林学会了出色地用俄文写作，但始终都不能流利地讲俄语。他讲俄语时讲得很轻、很慢，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革命者的圈子格外看重演讲的能力，斯大林因此经常感到自己的缺陷。但他以优秀的成绩从正教小学毕业，于 1894 年进入梯弗利斯正教中学。在正教小学尤其是正教中学里充斥着蒙昧主义、日常烦琐的监管和相互告发的气氛。学校里的制度严格，接近军队的纪律。难怪俄罗斯的正教中学不仅培养出政府和教会忠心耿耿的奴仆，而且还培养出革

① 20 世纪 40 年代末亚·卡兹别吉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先被用格鲁吉亚文再版，后来又用俄文出版。

命者。斯大林本人在 1931 年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说：

“我不能说我从六岁起就已经倾向社会主义了。甚至也不是从十岁或者十二岁。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十五岁开始的，那时候我和当时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为了抗议正教中学里所实行的侮辱人的校规和耶稣会士的办法，我决心要成为并且真的已经成为革命者，成为真正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了。”^①

梯弗利斯正教中学不仅为俄罗斯培养出了斯大林，而且培养出了米哈·茨哈卡雅、诺伊·饶尔丹尼亚、拉多·克茨霍韦利、西·吉布拉泽、尼·谢·齐赫泽、菲力浦·马哈拉泽等许多著名的革命家。从亚美尼亚正教中学毕业的革命家也不在少数。

正教中学无疑还在别的方面对斯大林产生影响。正教中学强化了他原有的机灵、狡诈和粗鲁。教条和偏执、他的文章和讲话特有的教理问答体的形成，无疑也不无教会教育的影响。斯大林从很年轻时起就彻底丧失了幽默感。“斯大林在正教中学中的朋友和同学们总是感到难过，因为柯巴一点也不会开玩笑。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格鲁吉亚人不懂玩笑。他会用最无恶意的玩笑报以老拳。”^②斯·阿利卢耶娃的《一年间》一书提供了比她的第一本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精确得多的斯大林的心理画像，斯大林的女儿在书中写道：

“教会教育是我的父亲受过的唯一的系统教育。我确信他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304—305 页，——译者注

② 杜宾斯基—穆哈泽，И：《奥尔忠尼启则》，莫斯科 1963 年版第 167 页。

在其中度过十年多时间的宗教学校对父亲一生的性格有着巨大的影响，强化并加固了他天生的品质。他从来没有宗教感情。没完没了的祈祷、强制性的神学教学可能会导致一个从来就不相信神、上帝的年轻人走向反面：对一切‘上天的’、‘崇高的’东西持极端怀疑的态度。相反其结果是‘尘世的’、‘清醒的’、实际而又放低的生活观所持的极端唯物主义、无耻的现实主义。他在自己身上没有发扬神学经验，而是发扬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方面：与不少表面上笃信、其实根本毫无信仰的神职人员所特有的虚伪、伪善、两面派作风有了密切的接触……他从自己正教中学的经验中得出结论：人是偏执的、粗暴的，欺骗自己的‘教民’，从而控制他们，玩阴谋，说谎话，弱点很多，德行很少。我把他身上偏执、不灵活、不能接受相反意见（假如这种意见明显更正确的话）这些缺点都归之于正教中学得来的经验，因为正教中学养成了学生的狂热和偏执。^①

斯大林本人也认为自己从 15 岁起开始了革命活动，当时他和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建立了联系，热中于阅读地下书刊。他这时第一次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据官方的说法，斯大林正是由于阅读禁书和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于 1899 年 5 月被正教中学开除，并进入梯弗利斯观象台工作。亚·乌拉姆在他的书中谈到格鲁吉亚革命者，“麦撒墨达西社”重要而著名的创建人之一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对年轻的斯大林的巨大影响。官方的斯大林传记甚至没有提起吉布拉泽的

阿利卢耶娃，斯韦特兰娜：《一年间》，伦敦 1969 年版第 341—342、355 页。

名字，因为吉布拉泽后来参加了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派，1918年参与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在1921年苏维埃格鲁吉亚建立时被捕，在1922年去世前不久才被释放。^①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和稍后的巴库社会民主党十分重要的组织者拉多（弗拉基米尔）·克茨霍韦利1897—1900年间对斯大林的影响不小。在《斯大林传略》编者的笔下，26岁的拉·克茨霍韦利变成了19岁的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众所周知，克茨霍韦利于1902年在梅捷赫城堡监狱被一个看守枪杀。1900年斯大林结识了32岁的职业革命者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库尔纳托夫斯基来到梯弗利斯并于1901年在该地被捕。流放者库尔纳托夫斯基在来格鲁吉亚之前不久在米努辛斯克见到过列宁。结识库尔纳托夫斯基，阅读列宁的著作和1901年开始在外高加索传播的《火星报》，使年轻的斯大林成了列宁的拥护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后，斯大林坚决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孟什维克派的影响在格鲁吉亚占优势。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在1917年的格鲁吉亚不仅是一支最有影响力的，而且是一支最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因此他们不久掌握了政权，在三年时间里领导了独立的格鲁吉亚政府。

1901年春天斯大林转入秘密状态。他参与组织罢工和游行，包括1902年3月著名的巴统游行。斯大林在巴统被捕并被流放至东西伯利亚，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两年时间。

列·托洛茨基在一篇文章中说斯大林1900—1910年间在写作上一无成就。这个说法不对。斯大林不仅是一个革命实践

家，他还以理论家自居，至少是外高加索的理论家。1900—1910年间斯大林写下了不少文章和小册子，但都是用格鲁吉亚文写的，发表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他这一时期的著作编成了《斯大林全集》的头两卷，其中大部分是直到1945—1946年才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的。20世纪初斯大林的著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当然都不能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其他领导人的著作相比。但是说斯大林在写作上一无成就是不对的。

琼·雅克·马里的《斯大林》一书写道：“当革命（1905年）爆发时，柯巴只是一个地区的积极分子。革命对于他来说毫无变化。革命没有‘发现’他，而在帝国的另一端革命却发现了托洛茨基。革命像个影子一样的从他身边越过。斯大林一贯是委员会、人数不多的中小领导者甚至高级领导者群体中的一员……柯巴不具有领导群众运动的任何品质：演说的才能、敏锐的思想、广阔的视野、对明天的感觉以及澎湃的热情。最后，当群众在一刹那间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变得崇高时，斯大林这个冰冷而内向的人面对这种热情却感到不知所措……

柯巴和革命彼此不相识。^①

这种说法同样不正确。不错，斯大林不是革命的演说家。他没有敏锐的思想。但把他说成是一个地区的积极分子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活动范围遍及外高加索，他参加了1905年在塔墨尔福斯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议以及1906年和1907年在斯德哥尔摩和伦敦分别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是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

马里，琼·雅克：《斯大林》，巴黎1967年版第36—37页。

主要发言人之一，他后来写道，他是从法国作者（鲍·苏瓦林）1935年在巴黎出版的斯大林传记中才知道斯大林参加过党的头几次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这个鄙夷的说法只能使人对他本人作出不佳的评价。当时参加党的代表大会的人数不多（第四次代表大会将近 150 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将近 350 人）。但是年轻的托洛茨基当时就极其高傲，不愿意看到许多并不突出的普通代表，何况还是“有发言权的”代表呢。

1905 年革命没有“发现”斯大林，他“像个影子”一样走过这场革命，“柯巴和革命彼此不相识”这样的说法同样不正确。不，革命发现了斯大林性格的许多方面，他参与了革命的许多重要事件，虽然通常他不愿意出风头。正是斯大林不光彩地不仅参与了，而且组织了某些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或者按当时的说法是“剥夺”。这些行动基本上是武装抢劫银行、邮车、轮船，布尔什维克当时把抢劫作为充实党的经费和购买武器以及打击沙皇政府的手段。武装抢劫梯弗里斯金库的行动格外轰动一时，这次行动使布尔什维克得到了 30 多万卢布的经费。这次“剥夺”是由卡莫（谢·阿·捷尔—彼得罗相）参与的一批战斗队员进行的，但是斯大林和中央战斗装备组领导人列·波·克拉辛参与了这次行动的组织和策划。组织这类“剥夺”行动不仅要求斯大林冷静沉着、狡猾和残忍，而且要求他与格鲁吉亚的刑事犯罪分子有勾结。许多次“剥夺”都出了人命，这是“为事业的利益”而杀人。

关于斯大林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事，不仅鲍·苏瓦林 1935 年出版的书中提及，托洛茨基无疑认真读过的 20 世纪 20 年代的许多出版物中也谈到过（见《斯大林文集（为庆祝五十寿辰而出版）》，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9 年版）。

20世纪 30—40 年代有大量文章和不少书籍描写斯大林在高加索的早期革命活动。这些作品把许多不存在的功劳归于斯大林。但包括拉·贝利亚在内的所有作者都对斯大林参与高加索恐怖行动一事讳莫如深。

1907 年斯大林转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组织工作。参与“剥夺”使他在梯弗利斯不无危险。加上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运动中占优势的孟什维克坚决反对搞恐怖活动。斯大林参加了组织当时巴库工人阶级的几次规模很大的行动，引起了列宁对他的注意。斯大林几次被捕，被流放，但每一次他都逃跑了，继续在高加索进行秘密工作。外高加索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谢·伊·卡夫塔拉泽后来回忆说，年轻的斯大林对同志们往往很粗暴，不能自制，经常对他们骂粗话。但这种行为并非绝无仅有的事，类似的粗暴和冲动在革命者的圈子里相当普遍。

关于这一时期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应该提到他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的去世。斯大林和她共同生活了几年。斯大林很爱他的妻子，她的死没有使他的性格变得温和些。他们的儿子雅科夫由亲戚照看。斯大林对他很少关心和照顾。

1911—1912 年斯大林在沙俄帝国的首都继续活动。彼得堡的《明星报》以及《真理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经常刊登他的文章。他的贡献显著。在 1912 年 1 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上他被缺席增补为党中央委员，还与菲·伊·戈洛晓金、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叶·德·斯塔索娃、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亚·瓦·绍特曼、阿·叶·巴达耶夫和阿·谢·基谢廖夫一起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国局的成员。

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斯大林的狂妄自大和不随波逐流，那就是：他虽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派，但并非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意列宁的看法。例如，1905—1906年斯大林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私有制的纲领。1909年斯大林在巴库报刊上反对列宁的组织政策。^①斯大林与列宁不同，主张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放弃抵制是“对老布尔什维主义偶然的偏离”。斯大林在一封信中写道：“但是是否因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使这些偶然的偏离一直偏离下去，把一只苍蝇变成大象呢？……伊里奇对这样的（合法）组织的作用多少估计得高了一些。”^②斯大林有几封信对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有些冷嘲热讽。斯大林读了波格丹诺夫答辩的著作，对他的某些结论表示支持，他还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我以为，伊里奇某些个别的失误被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地指了出来。另一个意见也是正确的：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而这一点伊里奇却违背逻辑的要求（为了外交的需要吗？）尽量加以掩饰……”^③如此看来，当时列宁对于斯大林来说并非无可争议的权威。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也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如下的指责：

“斯大林有一个时期在哲学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明确的。他对列宁反对马赫主义者的斗争意义估计不足……他在给米·格·茨哈卡雅的信中说，经验批判主义也有好的方面。他写道，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59—160页。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5年第2期第39页。

杜宾斯基—穆哈泽，И.:《奥尔忠尼启则》莫斯科1963年版第93页。

布尔什维克的任务是‘按照约·狄慈根的精神’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同时吸取“马赫主义”的好的一面’。然而，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约瑟夫·狄慈根这位自学成名的工人确实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著作，但他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离开了唯物主义，因此提议按照狄慈根的精神并考虑到唯心主义者马赫的哲学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不正确的。’^①

1910—1912年间斯大林并没有像列宁那样倾向于强化和深化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斗争。斯大林在布拉格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给米·茨哈卡雅的信中把列宁争取重建党组织的斗争说成是一场“杯水风暴”。^②斯大林在布拉格党代表会议之后与列宁不同，要求对所谓的取消派让步。斯大林给《真理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提到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要“不分派别”地团结起来。

列宁本人确实未必发现了这些分歧。斯大林第一次见到列宁是在1905年塔墨尔福斯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后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又见过。这几次会面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④但是列宁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位从高加索来的年轻的党的工作者。斯大林同列宁的个人交往是在1912年底才开始的，当时积极参与组织和编辑布尔什维克第一份合法报纸《真理报》的柯巴来到克拉科夫列宁处参

《苏联共产党历史》（六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卷第342页。

《邵武勉文集》，莫斯科1957年版第1卷第267页；杜宾斯基—穆哈泽，И.：《奥尔忠尼启则》莫斯科1963年版第92—93页。

洛吉诺夫，B. T.：《1912—1914年列宁和〈真理报〉》莫斯科1962年版第79、112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9—52页。

加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斯大林在波兰的这个地方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列宁赞扬了这篇文章。斯大林当时给列宁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列宁在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①

由于《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关系，列宁在这几个月里几次给斯大林本人写信。但是这些联系并不持久，列宁很快忘掉了斯大林的姓氏。1915年7月列宁写信问格·季诺维也夫：“您是否记得柯巴的姓？”^②季诺维也夫也不记得，于是列宁在1915年11月写信问维·阿·卡尔宾斯基：“恳请打听一下（向斯捷普科或米哈等人）‘柯巴’的姓氏（约瑟夫·朱……??我们忘了），此事很重要！”^③这是因为列宁收到了斯大林从图鲁汉斯克流放地写来的信，但由于忘了他的姓氏而无法作复。

斯大林在遥远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流放地度过了四年。斯大林在人数不多的流亡者中表现并不好。例如，布尔什维克菲利普·扎哈罗夫的妻子 P. Γ. 扎哈罗娃（布龙特曼）在关于她丈夫的回忆录中转述了她丈夫讲的1913年斯大林来到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的情景。

“菲利浦也给我谈了在图鲁汉斯克见到斯大林的情景……按照不成文的规矩，每个新来流放地的同志都要作关于俄国形势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243页。

② 同上，第47卷第137页。

③ 同上，第226页。

报告。还有谁能比这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更能引人入胜地、更深刻地阐明遥远的、离别已久的俄罗斯的事态呢？当时一批流放者其中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菲利浦，在修道院村劳动

斯大林恰好也应前往那里。杜勃洛文斯基当时已经不在人世。菲利浦天性不喜欢崇拜偶像，而且他听杜勃洛文斯基对当时重要的革命活动家——作过冷静的评价，因此对斯大林的到来并不特别兴高采烈。与他相反，斯维尔德洛夫则为了隆重地欢迎斯大林，在当时的条件下尽量做了能做到的一切。为斯大林安排了一个单独的房间，用少得可怜的钱准备了一点食物。他来了！

他进了为他准备的房间……再也没有露面！他也没有作关于俄国形势的报告。斯维尔德洛夫感到很难堪。斯大林被送往指定他居住的库雷卡村。很快大家都知道了，他拿走了杜勃洛文斯基所有的书籍归自己独自使用。可是在他来之之前流放者们已经一致商定，为了纪念杜勃洛文斯基，他留下的书籍作为流动图书由大家使用。为什么一个人有权把这些书据为己有呢？脾气急躁的菲利浦跑去跟他解释。斯大林对待他好像一个沙皇将军对待一个胆敢提出要求的普通士兵那样。气坏了的菲利浦（大家全都气坏了！）一辈子都记住了这次谈话给他留下的不快，永远也不改变他对斯大林的恶劣看法。^①

斯大林在库雷卡村表现也不好。他几乎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流放者都吵翻了，包括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内。

1913年斯维尔德洛夫给妻子写信说：“我们两个人。除了

引自尤·特里丰诺夫收藏的材料。P. 扎哈罗娃的回忆录曾部分发表在尤·瓦·特里丰诺夫《篝火的反光。消逝》一书（莫斯科1988年版第37—38页）中。作家尤·瓦·特里丰诺夫是联共（布）重要活动家瓦·安·特里丰诺夫的儿子。

我还有格鲁吉亚人朱加施维里，一个老相识。这个人不错，但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过于强烈的个人主义者。^①

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又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对他的批评更激烈。1914年5月他写道：“同我在一起在库雷卡有一个同志……我们彼此很熟悉。可是，最令人伤心的是，在流放、坐牢的条件下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暴露无遗，在各种琐事中都表现出来……我同这位同志现在各住各的，很少见面。”^②

斯大林与斯维尔德洛夫及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一直持续到斯大林调往修道院村，甚至在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流放者被征召入伍时还有冲突。当时流放在图鲁汉斯克的老布尔什维克弗·伊·伊万诺夫在20世纪50年代末写的回忆录中说：

“12辆大车的离去对修道院村来说是一件大事。被征召入伍一事本应使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和A. A. 马斯连尼科夫明白必须与大多数政治流放者恢复同志关系。从党的组织观点看也必须这样做，但是朱加施维里和马斯连尼科夫都没有这样做，再没有一个人和他们在一起……朱加施维里从库雷卡来到修道院村，住在马斯连尼科夫那里，依然与全体政治流放者保持很大的距离，也没有和两位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成员——斯维尔德洛夫和戈洛晓金——以及著名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恢复任何党内联系……这一必要的和解没有出现。朱加施维里仍然如此傲慢、内向，想着自己的计划……朱加施维里没有走向和解，而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却决心伸出友谊之手，愿意

斯维尔德洛夫，K. T.：《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莫斯科1960年版第199页。

② 《斯维尔德洛夫选集》莫斯科1957年版第1卷第276—277页。

在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三位成员的范围内讨论工人运动当前的问题 而这样的问题无疑是有的。’^①

流放，尤其是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是很重的处罚。但这毕竟不是服苦役，许多政治流放者利用被迫的闲散来充实自己的知识，从事写作，交换意见。但斯大林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却不会工作。《斯大林全集》第2卷刊载的最后一篇文章写于1913年1—2月，而收入第3卷的文章写于1917年3月。不能说斯大林一点没有参加党的生活。1915年夏天他参加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和被剥夺权利、流放西伯利亚的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的会议。1916年斯大林同一批布尔什维克联名写信给《保险问题》杂志。但是斯大林大部分时间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的。列·托洛茨基不放过任何刺伤自己对手的机会，于1930年写道：

“流放四年应该是紧张的脑力劳动的时间。流放者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日记，写论文，拟提纲，起草纲领，互相写信讨论问题，等等。斯大林不可能在流放的四年时间里不写一点关于战争、国际和革命主要问题的文章。可是我们要寻找在这不同寻常的四年里斯大林写作的一点痕迹都是枉费心机。怎么会这样的呢？十分明显，要是找得到一行斯大林提出反战失败主义的思想或号召必须成立新国际的文字的话，那么这些文字早就刊印出来，被拍成照片，译成各种文字，由各科学院和研究所加上各种学术注释了。但这样的文字没有找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斯大林根本什么也没有写过呢？不，不是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可思议了。但这意味着，在这四年中他所写的一切

阿·B. 斯涅戈夫收藏的回忆录手稿。